

清史論集(十)

莊吉發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清史論集

(十)

莊吉發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史論集 / 莊吉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民 86 -
冊；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88-)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110-6(第一冊：平裝) .-- ISBN
957-549-111-4(第二冊：平裝) .-- ISBN957-549-
166-1(第三冊：平裝) .-- ISBN957-549-271-4
(第四冊：平裝) .-- ISBN957-549-272-2(第五冊
：平裝) ISBN957-549-325-7(第六冊：平裝) .--
ISBN957-549-326-5(第七冊：平裝) ISBN957-
549-331-1(第八冊：平裝) ISBN957- 549-421-0
(第九冊：平裝) ISBN957- 549-422-9(第十冊：
平裝)
1. 中國-歷史-清 (1644-1912) -論文, 講詞等
627.007 86015915

文史哲學集成

④

清史論集(十)

著 者：莊 吉 發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四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2002)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422-9

清史論集

出版說明

我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等方面，雖然存在著多樣性及差異性的特徵，但各兄弟民族對我國歷史文化的締造，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滿族以邊疆部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一方面接受儒家傳統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具有滿族特有的統治方式，在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過程中有其重要地位。在清朝長期的統治下，邊疆與內地逐漸打成一片，文治武功之盛，不僅堪與漢唐相比，同時在我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亦處於承先啓後的發展階段。蕭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敘例中已指出原書所述，為清代社會的變遷，而非愛新一朝的興亡。換言之，所述為清國史，亦即清代的中國史，而非清室史。同書導言分析清朝享國長久的原因時，歸納為二方面：一方面是君主多賢明；一方面是政策獲成功。《清史稿》十二朝本紀論贊，尤多溢美之辭。清朝政權被推翻以後，政治上的禁忌，雖然已經解除，但是反滿的情緒，仍然十分高昂，應否為清人修史，成為爭論的焦點。清朝政府的功過及是非論斷，人言嘖嘖。然而一朝掌故，文獻足徵，可為後世殷鑒，筆則筆，削則削，不可從闕，亦即孔子作《春秋》之意。孟森先生著《清代史》指出，「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既認為仇敵，即無代為修史之任務。若已認為應代修史，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尊重現代，必並不厭薄於所繼承之前

代，而後覺承統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明初代元，以胡俗爲厭，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孫不能遵守。後代於前代，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爲法戒，乃所以爲史學。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事，非學問之事也。故史學上之清史，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爲貶抑，自失學者態度。」錢穆先生著《國史大綱》亦稱，我國爲世界上歷史體裁最完備的國家，悠久、無間斷、詳密，就是我國歷史的三大特點。我國歷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有清一代，能統一國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權，能綿歷年歲，其文治武功，幅員人材，既有可觀，清代歷史確實有其地位，貶抑清代史，無異自形縮短中國歷史。《清史稿》的既修而復禁，反映清代史是非論定的紛歧。

歷史學並非單純史料的堆砌，也不僅是史事的整理。史學研究者和檔案工作者，都應當儘可能重視理論研究，但不能以論代史，無視原始檔案資料的存在，不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治古史之難，難於在會通，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文獻不足；治清史之難，難於在審辨，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史料氾濫。有清一代，史料浩如烟海，私家收藏，固不待論，即官方歷史檔案，可謂汗牛充棟。近人討論纂修清代史，曾鑒於清史範圍既廣，其材料尤夥，若用紀、志、表、傳舊體裁，則卷帙必多，重見抵牾之病，勢必難免，而事蹟反不能備載，於是主張採用通史體裁，以期達到文省事增之目的。但是一方面由於海峽兩岸現藏清代滿漢文檔案資料，數量龐大，整理公佈，尙需時日；一方面由於清史專題研究，在質量上仍不夠深入。因此，纂修大型清代通史的條件，還不十分具備。近年以來，因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多涉及清代的歷史人物、文獻檔案、滿洲語文、宗教信仰、族群關係、

人口流動、地方吏治等範圍，俱屬專題研究，題為《清史論集》。雖然只是清史的片羽鱗爪，缺乏系統，不能成一家之言。然而每篇都充分利用原始資料，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認真撰寫，不作空論。所愧的是學養不足，研究仍不夠深入，錯謬疏漏，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教正。

二〇〇二年二月 莊吉發

清史論集

(十)

目次

出版說明·····	1
德治·法治·文治——從奏摺制度的沿革論盛清諸帝 的治術·····	1
圖理琛著《異域錄》滿文本與漢文本的比較·····	35
從《朝鮮王朝實錄》看朝鮮君臣心目中的中國帝王·····	53
清代起居注冊與滿學研究·····	69
戰爭與地理——以清朝嘉慶初年川陝楚白蓮教之役為例·····	109
清代道光年間的民間秘密宗教·····	141
清代漕運糧船幫與青幫的起源·····	181
清宮檔案中口供史料之評估與運用·····	213
清代檔案的典藏整理與軍事史研究·····	247
清季出使經費的籌措·····	259
清季釐金與新政經費的來源·····	281

德治·法治·文治

——從奏摺制度的沿革論盛清諸帝的治術

一、前言

滿族入關後，統治清朝歷時二六八年（1644-1911），其間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3-1735），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這三朝皇帝在位共一三四年，恰好佔了一半，其文治武功，遠邁漢唐，這三朝即所謂盛清時期。公題私奏是明代以來使用的傳統本章，奏摺是從奏本因革損益而來屬於體制外的一種新文書，肇始於康熙年間，雍正年間放寬專摺具奏權，乾隆年間奏摺的採行，更形制度化，考察奏摺制度的沿革及其性質，有助於了解清初盛世開創的關鍵，盛清諸帝對奏摺的批示，也各有千秋，從奏摺硃批的旨意，亦可對盛清諸帝的治術，進行比較。

《清史稿·本紀》論盛清諸帝的施政特點，略謂康熙皇帝政尚寬仁，雍正皇帝以嚴明繼之，乾隆皇帝運際邳隆。後世史家亦稱康熙皇帝主張寬和，近乎德治；雍正皇帝主張嚴厲，近乎法治；乾隆皇帝主張寬猛並濟，近乎文治。盛清諸帝勤求治理，其施政理念，各有主張，亦有其延續性。本文撰寫的旨趣，主要是就現存硃批奏摺等資料，對所謂德治、法治、文治的政治主張提出粗淺的看法。

二、奏摺的起源及其性質

清初本章制度，沿襲明朝舊制，公題私奏，相輔而行。循常例行公事，使用題本，鈐印具題；臣工本身私事，則用奏本，概不鈐印。直省臣工題奏本章，均須投送通政使司轉遞，本章若有違式，或逾限者，通政使司即行題參。奏摺雖然是由奏本派生出來的一種新文書，但奏摺與奏本的性質，並不相同，不可混為一談。硃批奏摺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康熙前期^①。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七日大學士伊桑阿《奏謝溫諭賜問平安摺》，應該是目前所知較早的一件硃批奏摺，康熙朝起居注冊內關於奏摺始行的時間，還有更早的記載，說明在康熙二十年（1681）前後已有奏摺文書的記載^②。

康熙皇帝親政以後，為欲周知施政得失，地方利弊，以及民情風俗等等，亟欲於傳統題奏本章外，另外使用屬於皇帝自己的通訊系統，於是命京外文武大臣於露章題奏之外，另准繕寫摺子具奏，一方面沿襲奏本的形式，而簡化其格式；一方面沿襲密行封進的舊例，逕達御前。奏本與題本的主要區別是在於事件內容的公私問題，奏本限於臣工本身私事時使用，但奏摺與奏本不同，奏摺內容，無論公私，凡涉及機密事件，或多所顧忌，或有改弦更張之請，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或慮獲風聞不實之咎等等，都在摺奏之列。奏摺的款式，較奏本簡便，末幅不必書明紙張字數，不用細字體書寫。為求保密，臣工具摺時，必須親手書寫，字畫要粗大，不必按奏本用細字體書寫。奏摺繕畢，多由親信家丁齎遞入京，不得擅動驛馬，不經通政使司轉呈，而逕至宮門呈進，或由皇帝親信大臣轉呈，不得至公門遞進，必須密達御前。皇帝親自啓封披覽，亦親手批諭，或硃批，或墨批，或批於末幅，或

批於簡端，或批於字裡行間，一字不假手於人。康熙皇帝曾因右手病痛，不能寫字，而改用左手執筆批諭^③。因此，康熙年間採行的奏摺，是政府體制外的一種通訊工具，密奏制度就是皇帝和相關文武大臣之間所建立的單線書面聯繫，皇帝和京外臣工可以直接秘密溝通。奏摺無論在格式，傳遞過程與政治功能等方面，都與明初以來通行已久的奏本不同。

奏摺的名稱，並不是因其文書形式的摺疊而得名，奏摺的「摺」，原本是指摺子，意即清單，例如引見摺子，即引見姓名清單。康熙年間採行奏摺之初，多使用「摺子」字樣，其含義已不限於清單。在康熙年間的文獻裡，「摺子」字樣到處可見。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初二日，《起居注冊》記載是日早康熙皇帝御乾清門聽政，大學士、學士等會同戶部並倉場，為漕運凍阻具摺請旨，康熙皇帝對閣臣說：「此摺著戶部領去具本來奏。」^④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二十九日，《起居注冊》記載是日辰刻，康熙皇帝御門聽政，吏部題補戶部侍郎李仙根等，並所察貴州巡撫楊雍建降級摺子。因楊雍建有效力之處，奉旨將所降五級復還^⑤。所議降級摺子，並非清單，而是奏摺。由此可知，在康熙前期，奏摺的使用，已經十分普遍。康熙年間以來的奏摺制度，在性質上是屬於密奏制度，都可以自行封進，但它不在形式上是否書明「密摺」等字樣，或在內容上以重大機密事件為限。其所以稱為密奏者，在表面上固然因奏摺都是由特定人員直接呈給皇帝本人的一種秘密書面報告，而不是經內閣公開處理的文書。其實也是由於奏摺只是皇帝和臣工在體制以外私下秘密通訊的信函，而非外朝政府正式的公文。雍正皇帝日理萬幾，日則召見臣工，夜則燈下批摺，有時則墮淚披覽。署直隸總督蔡珽具摺奏聞鑲紅旗漢軍候選縣丞張鍾人品學問，原摺奉硃批：「白日未得一

點之暇，將二鼓，燈下書字，不成字，莫笑話。」^⑥雍正皇帝批覽奏摺多在夜晚，不僅是「以示勤政」，其實，一方面固然不令洩漏機密，一方面也是因為摺奏是體制外屬於皇帝自己的私事，故於公務之餘，閱摺批諭。題本與奏摺，也有公私的分別，但所謂公私，不在文書內容的公與私，而是在於內朝與外朝的不同。題本是督撫等以衙門首長的地位，於處理例行公務時呈遞皇帝的公文，而奏摺則為督撫等在公務之餘，另以私人身分呈遞皇帝為內朝效力的書面報告，就康熙、雍正兩朝而論，奏摺尚非正式的国家公文，仍未取得國家法理上的地位，奏摺內容及硃批旨意，仍不可據為定案。臣工奏摺奉到批諭後，若欲付諸施行，仍當另行具題。乾隆年間，奏摺逐漸化暗為明，終於廢除奏本，奏摺遂取代了奏本。

三、康熙皇帝的德治思想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即已深悉儒家思想有利於統治政權的鞏固，順治十年（1653）四月，禮部將「崇儒重道」定為基本國策，在各省設立學宮，令士子讀書，各治一經，以培養教化^⑦。康熙皇帝提倡堯舜之道，他以上接二帝三王的正統思想自居。他認為孔孟之道，朱熹之學，遠較佛、道空寂之說，更有利於政治^⑧。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二十九日辰時，康熙皇帝御弘德殿，講官喇沙里等進講畢，康熙皇帝對喇沙里等人說道：「卿等每日起早進講，皆天德王道修齊治平之理。朕孜孜問學，無非欲講明義理，以資治道。朕雖不明，虛心傾聽，尋繹玩味，甚有啓沃之益。雖為學不在多言，務期躬行實踐，非徒為口耳之資。」^⑨康熙皇帝就是儒家政治理念的躬行實踐者，他的德治與寬和觀點，與儒家思想息息相關。顧慕晴著《領導者與官僚操守：清聖祖的個案

研究》一書也指出，「仁」乃儒家思想的核心，正如康熙皇帝諡號所顯示的，他對治國的基本想法，主要是承襲了儒家思想而來，他要成就自己為一「儒家皇帝」。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在親政初期，由講官熊賜履、喇沙里、陳廷敬、葉方藹等在弘德殿講解四書五經，並相互討論，使他對儒家治國的觀念、想法，充滿了興趣^⑩。康熙皇帝對德治的體察，主要表現在尚德緩刑的理念上。他認為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因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倘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捨本而務末^⑪。康熙皇帝從親政之初就決心效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由尚德緩刑又導引出寬和安靜的治道。他指出，「為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立異。」^⑫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初四日辰時，康熙皇帝御瀛台勤政殿聽理政事，山東巡撫錢瑛陛辭，康熙皇帝諭以「為治之道，要以愛養百姓為本，不宜更張生事，爾到地方，當務安靜，與民休息。」^⑬治國之道，莫要於安民。地方安靜，官員不擾民，是促成政權穩固最基本的要求。康熙三十三年（1694）八月初一日酉時，康熙皇帝御千佛寺行宮聽政後指出「於地方生一事，不如損一事。」^⑭

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初九日，安徽巡撫線一信陛辭，奏請訓旨，康熙皇帝諭以「爾為外官年久，盡諳事情，惟真心效力，不可生事。凡督撫蒞任，即題參官員，所參且多。」^⑮康熙皇帝面諭線一信到任後，務須詢訪確實，方可題參，勿效舊習。江寧織造曹寅兼管巡鹽御史，他具摺奏陳禁革浮費情形。原摺奉硃批：「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為目前之計，恐後尾大難收，遺累後人，亦非久遠可行，再留心細議。」^⑯不生事端，就是為官之道。江西巡撫郎廷極具摺奏陳江西兵糧情形，原摺奉硃批：「知道了，做官之道無他，只以實心實政，不多生事，官民愛之

如母，即是好官。」^{①⑦}康熙皇帝認為總督、巡撫，但於地方不生事，年歲豐登，錢糧清楚，便是好官。戶部侍郎王度昭署理偏沅巡撫後具摺奏聞地方情形，因「楚風健訟」，所以王度昭以「和靜治之」，冀能彼此相安。原摺奉硃批：「這奏的是，前任巡撫做官雖有清名，衆論不服，所以如此，地方只以安靜，自然百姓受福。」^{①⑧}湖廣鎮筵總兵官張谷貞奏聞苗疆事宜，原摺奉硃批：「此摺奏的是，須要小心，不可生事，繞〔擾〕害良民。」^{①⑨}鎮筵將軍張自興具摺謝恩，原摺奉硃批：「近日西邊有事，正文武出力之時，內地提高和皇帝權力的強化。雍正皇帝即當奏知。」^{②①}內地安靜，政治安定，安內然後攘外，為政安靜與寬和，都是德治的具體表現。偏沅巡撫潘宗洛陛辭奏請訓旨。康熙皇帝諭以「凡為督撫者，操守甚為緊要，爾宜潔己，為下屬表率。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馭下宜寬，寬則得衆，為大吏者若偏執己見，過於苛求，則下屬何以充當？」^{②②}利弊相隨，以不生事為貴；馭下宜寬，寬則得衆。安靜不生事，馭下宜從寬，是德治的一體兩面。康熙皇帝認為治理地方，應該從容，不可太急，致治之道，不宜太驟。浙江巡撫王度昭奏陳浙江吏偷民玩、兵弱盜熾情形，原摺奉硃批：「爾雖到任未久，覽其奏摺，治法頗好，凡事不可太急，從容更便。」^{②③}廣西巡撫高其倬奏聞操練標兵添造綿甲情形，原摺奉硃批：「是，調理營伍，不可太急。」^{②④}辦理庶政，「凡事得中為善，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②⑤}

康熙皇帝自幼讀書聽政，早已體察到治國之道，莫要於寬舒。凡為總督、巡撫者，操守最為緊要。康熙皇帝認為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為官之道，當清而寬，不可過恃其清。為君者亦宜寬，不可嚴刻。他教誨臣工「辦事當於大者體察，小事不可苛求，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無過失者。」^②他相信倘若吹毛求疵，則「恐天下大小臣一日不能自安矣！」戶部尙書趙申喬曾因司官事情不行呈閱，認爲被司官藐視，無顏居職，極爲忿恨。康熙皇帝面諭趙申喬說：「寬則得衆，爾性苛急，不能容人，必致人無地自容而後快。」^③當浙江巡撫徐元夢覲見請示訓旨時，康熙皇帝面諭徐元夢說：「用人宜隨材器使，不可求全。爾遵朕此旨，切切在念，惟以寬恕爲本。」^④

康熙皇帝主張用人施政，皆當中道而行，以求寬嚴和平。江南鎮總兵官高其位具摺奏聞營伍虛冒扣剋兵糧情形，原摺奉硃批：「凡武官不可責之過於清，如陳瓚之清，留禍於後官，以至臺灣之反，其來有自，作大官者，須要得體，寬嚴和中，平安無事方好。若一味大破情面，整理一番，恐其多事，而得罪者廣，須留心斟酌。」^⑤寬嚴和中，寬以濟猛，就是寬猛並濟，都是帝王治理國家的本原。當直隸巡撫于成龍陛辭時，康熙皇帝召于成龍至乾清宮御座前問話。于成龍奏稱：「臣年已四十九歲，自小官至於巡撫，特出上裁者，惟一廉耳。若有改其操守，不但國法難容，即天下言清廉者，皆不可信。」康熙皇帝諭以「廉吏間或有之，及既得大官，往往改操，爾須正己率屬，廉潔愛民，但亦宜寬以濟猛，勿過刻也。」^⑥康熙皇帝屢諭封疆大吏正己率屬，廉潔愛民，寬以濟猛。

施政從寬，是康熙皇帝實踐德治的最基本要求。總兵官蔡元具奏議修古北口傾頽邊牆，康熙皇帝斥責蔡元未諳事宜。康熙皇帝認爲「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因爲守國之道，「惟在脩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⑦康熙皇帝相信衆志可以成城，寬則得衆，得衆則得國。大學士王熙也認爲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學士張玉書覆奏時亦強調「自古治國在德，不在險。」康熙年間，君臣對德治，大致已經形成共識。康熙皇帝主張德治，崇尚德教的主要用意就是「期與中外臣工共適寬大和平之治。」³¹他相信德治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準繩。

德治重視的是人治，康熙皇帝對督撫等封疆大吏的要求是正己率屬，持己以正。康熙皇帝勤求治理，他指出，「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草率，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畫於胸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蓋大吏賢能，自足表率僚屬。今貪墨之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默化也。」³²康熙皇帝認為「為政以中正誠敬為本，中正則能公，誠敬則能去私。」³³他強調人治，他相信為政之道，端在用人，得一人則事治，失一人則事敗³⁴。康熙皇帝深悉用人關係重大，群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緊要員缺，特令會推，原期為國得人，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惕慮，惟恐溺職，累及薦舉者，因而自加勉勵。康熙皇帝深信有治人，無治法。從來都沒有無弊之法，得其人，變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雖典謨官禮，亦難盡善。他認為國家建設職官，料理庶務，必須精白矢志，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³⁵。福建巡撫六永譽陛辭請示訓旨，康熙皇帝諭以「大法小廉，巡撫清廉，屬員自不敢貪污，且為人以顏面為重，爾身係大吏，須顧顏面，務勤慎小心，以副朕愛民之至意。」³⁶康熙皇帝勉勵封疆大臣實心辦事，不可矯廉，徒尚虛文。「凡為小吏者，律己廉潔，便可稱善。大臣則自有大臣之體，當行有益於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猶諒之。未若自恃廉潔，貽累地方之為甚³⁷。操守固然重要，但不可自恃廉潔而貽累地方。康熙皇帝召見湖南巡撫陳璜時曾諭以「爾為巡撫，與為司道等官不同，若貪財好利，厚載而歸，誠為非道。但

應得之物，亦宜取為賞兵之需。身為封疆大吏，而室中蕭然無一物可以與人，亦非大臣所宜。」³⁸江西巡撫郎廷極因奉命帶理兩江總督，郎廷極具摺謝恩，原摺奉硃批：「做官之要，莫過公正清廉。」³⁹郎廷極具摺密陳江西武官居官情形，原摺奉硃批：「朕所以問者，因湖南有空糧之告，浙東有虛兵之名，天下錢糧養兵者，豈一日不備，凡武職當各盡其力，以報朝廷纔是。古人有言，文官不要錢，武將惜死〔不惜死〕，不怕天下不太平，信哉！」⁴⁰為官公正清廉，但不可矯廉。

由於康熙皇帝勤求治理，用人施政已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他並未因此而自滿。他認為「堯舜之世方可稱無闕失，然猶兢兢業業，不敢謂已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主，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云主聖臣賢，政事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⁴¹康熙皇帝御乾清門聽政時面諭張英說道：「堯舜之時，猶有都兪吁咈，蓋已治而益求其治，已安而益求其安，古之聖人兢兢業業，始終如一。朕朝夕以此警惕於衷，三十餘年以來，未嘗一日少自寬假。亦有請問日理事者，朕不以爲然，惟存恆久之心，時時乾惕耳！」⁴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止於至善，以求長治久安，就是帝王治理國家的目標。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二月初九日，康熙皇帝御暢春園內澹寧居聽政，他面諭大學士松柱等人云：「年來各省吏治俱勝從前，雖已治而益求治，已安而益求安，豈不望其更加砥礪？然今日之官，不可以比昔日之官，即部院衙門官員，亦皆清苦。往年充一筆帖式，家計旋饒。今即戶部衙門，求一刁猾書吏亦不可得，蓋此輩無利可圖，自然散去也。」⁴³吏治澄清，治益求治，無利可圖，書吏遁形。康熙皇帝指出，「天下承平久矣，自昔太平日久，必生事端。今內而各部院大臣，外而各省督撫提鎮，漸耽逸豫，事務稍涉疏略。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朕之素志也。爾等當體朕慎終如始之意，共勩有終之美。」^④國家承平日久，大小臣工，不免廢弛，但康熙皇帝爲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要求內外臣工有始有終，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貽謀遠大，仍有其積極性。

四、雍正皇帝與密奏制度的制衡作用

康熙皇帝採行密奏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周知中外以外，主要是想利用奏摺的批諭，以訓誨臣工，勉勵文武大臣做好官。江南提督吳郡具摺請安，原摺奉硃批：「朕安，爾等皆係行伍出身，漢仗自然好，須存良心，做個名將，地方軍民，安居樂業，何等體面。近聞閩省有許多事，提督聲名亦就可知，公論難逃，夙夜留心。」^⑤從奏摺硃批諭旨也可以反映君臣關係，江南提督師懿德具摺請安，原摺奉硃批：「朕安，久不見爾奏摺，朕常掛念，今奏摺到來問及家人，方知爾好。」^⑥康熙皇帝關懷大臣之情，躍然紙上。江寧巡撫宋犖具摺請安，原摺奉硃批：「已有旨了，年老之人，飲食起居，須要小心。」^⑦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雍正皇帝即位以後，其用人行政有其連續性。雍正皇帝擴大採行密奏制度，主要也是把奏摺作爲訓誨臣工的工具。雍正皇帝整飭吏治中的一個主導思想，也是注重儒家政治理念中的人治，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因此，培養政治人才，進行政治教育，下情上達，君臣溝通，增進情誼，多藉奏摺通訊來發揮功能。雍正皇帝在奏摺的批諭，大抵也是教誨之旨居多。《雍正硃批諭旨》中勗勉各省文武大員打起精神做好官，垂之史冊的硃批旨意，占了很大的篇幅。安徽巡撫李成龍具摺奏報二麥收成情形，原摺奉